

朝向一種想像人類學的遺產研究： 檳城案例*

李威宜

國立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

面對數十年來遺產研究的熱議趨勢，當代人類學的知識生產，可以發揮什麼作用？本文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無形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公約制定過程的爭點切入，說明人類學者在當代遺產體制變革中的兩種新角色：參與決策制定、觀察中介活動。再以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ICH的實作經驗為例，檢視遺產工作者搶救思維與檔案化的侷限，並重新檢討ICH護衛觀念的困擾，釐清人類學對於ICH「再現」議題的觀點。然後，我將提出一種想像人類學的遺產研究新取向，以遺產中介者為調查對象，觀察想像力在走動式體驗案例中的作用。最後在結論部分，本文將嘗試闡發「遺產想像」的詮釋觀點，具體表述為三個由檳城實作觀察得出的文化遺產理念：復返傳統脈絡的想像工具、打造無形基礎設施的想像工程、訊息交流的想像轉化。

關鍵詞：遺產想像，中介者，再現，走動，無形文化遺產，檳城喬治市

投稿日期：2018.8.27 接受刊登日期：2019.7.2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社會想像：當檳城華人遇上世界文化遺產》（MOST 104-2410-H-007-016-MY2）的部分成果。謝謝研究助理洪伊君、陳智培、蔡念澄、施以慈的協助，檳城田野報導人的訊息交流，以及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惟文責由本人自負。

一、問題意識：當代人類學的知識生產，可以對遺產研究起什麼作用？

世界文化遺產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全球文化體制 (Geismar 2015)，在各地產生了複雜的社會現象，並引起了學界的熱切關注，提出眾多值得留意的研究取向。例如，將遺產視為支持文化保守主義的價值回歸 (Lowenthal 1985)、遺產工業 (Hewison 1987)、新殖民主義 (Byrne 1991)、新自由主義下的古蹟縉紳化 (Harvey 2001a) 與空間清理 (Herzfeld 2006)、新形式的財產觀念 (Brown 2004 ; Hirsch 2010)、知識經濟 (Graham 2002)、遺產景觀 (Di Giovine 2009)、遺產旅遊 (Hitchcock、King & Parnwell 2010)。或是將遺產作為一種長時期的歷史過程 (Harvey 2001b)、民族學家返鄉的調查機制 (Jeudy 2001)、形而上的文化生產 (Kirshenblatt-Gimblett 2004)、以鄉愁作為動力的制度 (Berliner 2012)、社會運動的記憶劇場 (Samuel 1994) 或社會行動 (Byrne 2008 ; Silverman 2017)。近年來批判性的遺產研究 (Harrison 2010, 2013)，更將遺產從作為物質文化的唯物取向，轉移到遺產作為論述的取向，對專家與技術性的權威問題展開批判 (Smith 2005)。

面對遺產研究的熱議趨勢，當代人類學的知識生產，可以發揮什麼作用？本文首先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無形文化遺產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公約制定過程的爭點切入，說明人類學者在當代遺產體制變革中的兩種新角色：參與決策制定、觀察中介活動。再以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ICH的實作經驗為例，檢視遺產工作者搶救思維與檔案化的侷限，並重新檢討ICH護衛觀念的困擾，釐清人類學對於ICH再現問題的觀點。然後，我將提出一種想像人類學的遺產研究新取向，以遺產中介者為調查對象，觀察想像力在走動式遺產經驗中的社會作用。最後在結論部分，本文將嘗試闡發「遺產想像」的詮釋觀點，具體表述為三個由檳城實作觀察得出的文化遺產理念：復返傳統脈絡的想像工具、打造無形基礎設施的想像工程、訊息交流的想像轉化，以期更新人類學對於無形文化遺產研究的思路與方法。

二、如何邁向無形？人類學者在世界文化遺產體制 變革中的新角色

自UNESCO於1972年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以來，世界遺產體制所倚重的專家背景，主要來自建築、藝術史與自然史等領域，這當然與古蹟修護的材質、風格、形式等知識和動植物生態保護等專業有關。然而，到1989年UNESCO公布《護衛民俗與傳統文化建議書》（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Folklore），以及九〇年代起草《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宣言》（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再到2003年公布《護衛無形文化遺產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人類學的觀點日益受到重視，甚至承擔起關鍵任務。這顯然與UNESCO在制定無形文化遺產（ICH）政策時，需要考量非歐陸、南半球及原住民觀點的人類整體視野有關。

（一）人類學觀點在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制訂過程中的作用

要說明人類學者在當代遺產體制變革中的新角色，我們可從90年代ICH公約的發軔過程與爭論焦點切入。UNESCO無形文化遺產部的Noriko Aikawa-Faure女士，¹當時負責發展ICH計畫、起草ICH公約、帶領並跟進公約制定工作，就這一過程，從會議召開與專家建議的內部觀點，做了清楚的解釋（Aikawa 2001, 2004）。她指出，1996年西班牙作家Juan Goytisolo為搶救Jamaa'el-Fna歷史廣場，避免其受到都市計畫的摧毀，希望以國際認可的力量來拯救該文化空間。這一事件促成1997年UNESCO在摩洛哥古城Marrakech的會議，與會學者強調口述和無形遺產的重要性，南半球國家更抗議UNESCO長期不公，希望增列文化地景項目。之後一些國家起草並提交UNESCO設

1 Noriko的早期作品（2001, 2004）以Aikawa為姓，2009年作品開始以Aikawa-Faure為姓。

立《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宣言》，但這個以日本和南半球國家為主的聲明，卻遭到西歐國家的反對，質疑無形文化遺產的傑作要如何定義？普世價值要如何賦予？社群又如何具體執行？（Aikawa 2004）。

Noriko Aikawa-Faure也說明了在1999年華盛頓會議召開時，UNESCO重新檢討1989年所制訂《護衛民俗與傳統文化建議書》的爭論，其中值得我們關注的，是與會者指出民俗與傳統文化的定義存在侷限，太過物品導向，忽略相關的象徵、價值與過程，並在方法上太重研究和研究者，忽略了創造文化、展演傳統的實務工作者與社群。因此華盛頓會議提議，有必要取代民俗與傳統文化的觀念，改採一套新的標準與設定規範，亦即無形文化遺產（ICH）的觀念。2001年Turin會議舉行，即在釐清ICH術語的規模與定義，²並達成幾點共識：包括參與式民主、文化表達系統的保護、產物／生產／過程的觀點、區分商業過程與內部社群活動等。2001年西班牙Elche會議，不僅認可了Turin會議對於ICH定義，也釐清傑出價值的標準，³以及傑出作品術語的定義。⁴2001於Rio召開的UNESCO大會，認為應在2001年《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的框架下，草擬新的國際公約，首次將ICH與文化多樣性的政治連結建立起來，並認為新公約應包括一個可促進對ICH之不同面向的公共覺醒。2003年UNESCO正式公布《護衛無形文化遺產公約》（Aikawa-Faure 2009）。

ICH公約制定過程中，我認為有三個轉折點特別值得留意，都是受到人類學知識典範不斷轉移的影響：

-
- 2 在2001年Turin會議，提出了「無形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術語的定義為：「人們在學習過程中由其自身發展和具體化所伴隨的知識、技藝和創造力，他們所創造的產物，以及其它對其永續性所需的社會與自然脈絡、空間與資源。這些過程提供了現存社群一種與先前世代的連續感，不但對其文化身分很重要，也護衛了文化的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力。」（Aikawa-Faure 2009：31）
 - 3 在2001年Elche會議，明確了「傑出價值」（outstanding value）的標準，如下：「a、傑出價值是社群所關注的，也是為了文化多樣性的維持；b、保管社群的長久實踐；c、與特定文化空間相連的特殊創造品。」（Aikawa-Faure 2009：32）
 - 4 在2001年Elche會議，亦設定了「傑出作品」（masterpieces）術語的定義：「基於任何文化都可能擁有傑出作品的事實，而且不會受到任何特定歷史與文化參考的限制。一項傑出作品（在田野中關注的），被理解為對一種獨特價值的文化宣示，其承載了表達的自由和人們創造性的才能，無法以任何外在的評量標準來衡量，並對抗任何正式的規則。」（Aikawa-Faure 2009：33）

第一、1999年華盛頓會議的召開，將1989年設定的「民俗與傳統文化」更訂為「無形文化遺產」的典範轉移，中間是經過了幾個概念界定上的轉化。1991年UNESCO大會決定在物質文化遺產和文化認同強化兩個方案間，增設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Non-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的新概念，以強調後者在前兩者之間所扮演的雙重角色。隔一年，UNESCO就七、八0年代傳統大眾文化場域的學術進行評估，認為需將非物質文化概念修正為無形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以避免落入物質中心主義的二元對立問題，並於1993年草擬ICH方案的新方針（Aikawa 2001）。從此遺產觀念的認識論，從有形古蹟、民俗與傳統大眾文化等既有概念，經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轉折，進入到無形文化遺產概念的使用時代。

第二、在1997年Marrakech會議前，UNESCO授權加拿大遺產法專家Marc Denhez探索一種新的論述可能。他將文化空間定義為文化活動發生的地點，具有隨時間而改變的特質，其存在仰賴文化表達的存在（Denhez 1997）。這使得ICH的觀念屬性，超越了物質／空間與非物質／文化二分的慣習，同時內涵空間、時間與社會三個向度，必須整體考量地點、活動和變遷的辯證關係，再也不會輕易掉入去脈絡化的象徵主義和藝術史的形式主義等窠臼，具有深刻的人類學意義。

第三、在2001年Turin會議前，由UNESCO委託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和Lourdes Arizpe兩位人類學家，針對全世界各地ICH與傳統知識的各項術語進行普查，並向會議提出調查報告與建議。其中芝加哥大學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的幾個意見值得留意，她提出從產品轉向生產過程的觀點，認為傳統知識不應再被視為是一種遠古流傳至今的事物，而是因其特定的獲取方式和使用方式才獨具價值。因此文化遺產的護衛，必須包括其存在社會與脈絡的保護，也需要支持文化遺產之生產者為其參與者和能動者。她建議新機制的首要目標，要關注活的處理程序（living process），而非排他性的歷史過程（Aikawa-Faure 2009：23）。由於人類學觀點的融入，ICH概念的核心價值，便蘊涵了一種使用的、能動的、活生生的處理程序與生產過程之實作意義，而不再膠著於遠古性之起源意義。

(二) 第一種角色：參與遺產體制的決策制定

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⁵和Lourdes Arizpe⁶兩位教授都來自中南美洲，長期關注原住民議題，後來發表了一系列ICH論文（Da Cunha 2001, Arizpe 2012, 2015）。特別是Lourdes Arizpe和Cristina Amescua於2013年主編《無形文化遺產的人類學觀點》*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出在快速發展的國際文化合作框架中，需要開展ICH的新的人類學研究。該書說明了國際人類學和民族學學會（IUAES）於2010年12月成立無形文化遺產委員會的緣由，並由Lourdes Arizpe擔任主席，推動這一領域的人類學交流。無形文化遺產委員會於2012年2月在墨西哥Cuernavaca CRIM舉辦第一次規劃會議，認為替ICH研究提出新的課題和主題是一個優先課題（Arizpe and Amescua 2013），並就無形文化遺產研究的人類學挑戰進行討論（Machuca 2013）。

之後Lourdes Arizpe在《文化、多樣性與遺產》*Culture, Diversity and Heritage: Major Studies*（2015）乙書，更深入說明了ICH觀念與人類學知識系譜的關係。她將ICH概念的生成，視為一種「文化工地」，以此理解人類活動的展演是一種不斷刻畫過程。所謂工地概念，引用法語chantier一詞，是指人類創造性的知覺如同一種持續進行的工程，與既有的科學和政治概念要不斷協商。而ICH概念的提案，她認為正是接收長期以來人類學多義的文化概念，不斷加工修建而繼續承載下去的操作（Arizpe 2015 : 101）。

Lourdes Arizpe更表示，如果人類學者能夠回應當代社會如何創造新的文化指引的挑戰，那麼人類學科便可積極協助人們在新的框架下面對文化轉型的問題。因此她認為，人類學者需要主動參與這個過程。文化不再被視為是

5 芝加哥大學教授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1943-），巴西科學院院士，學術生涯最先是在巴西取得社會人類學博士學位（1975），1984年在聖保羅大學人類學系工作。她的專長是在亞馬遜的田野工作，致力於美洲原住民研究，關注族群認同、傳統知識、原住民權利、傳統人民的智慧財產權等議題。

6 Lourdes Arizpe（1945-）是墨西哥人類學者，曾任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主席（1988-1993），UNESCO文化諮詢總幹事（1994-1998）與ICH顧問，關心ICH作為社會資本、原住民與民族主義、移動人群與婦女、文化與社會的永續性，並將遺產議題帶進政策與世界議程的研究。

網綁式的、固定的實體，而是被定義成一種競爭地。而當文化不再只是可見之物時，文化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成為一種意義的不斷流動。這些新觀念的出現，讓UNESCO的遺產方案，開始採用生活性的實踐術語來討論文化的發展、自由和多樣性等問題（同上引：101-108）。

那麼，在21世紀的ICH實踐場域，人類學家還能將自己視為旁觀者嗎？如何才能在今日漂流的全球空間中，定位人類學所生產的知識？Lourdes Arizpe的回答認為，人類學者需往前跨出一步，介入ICH實作領域的參與觀察，以理解觀念的流動，協助決策的擬定。她將自己介入UNESCO的經驗，稱作是一種「參與式的決策制定」（participant decision-making），並認為從事人類學研究數十年來培養的反思能力，讓自己能快速轉化人類學的觀念和方法，以面對當前的重大問題。她認為，人類學者是能夠在新世界脈絡中成為再概念化時空定位的重要夥伴。因此她期許人類學者積極發展一種主動反思，以參與建構新的文化和社會實體（同上引：110-116）。

Lourdes Arizpe和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透過積極參與UNESCO全球遺產體制的決策制定，將人類學在各地進行民族誌研究的特殊觀點，推向全球普遍文化概念的創新。她們為人類學者在遺產場域的參與決策角色，提供了一種行動典範。

（三）第二種角色：觀察遺產場域的中介活動

ICH理念的實踐，並不止於UNESCO的公約制訂與良善規範的決策而已，還需要面對全球各地複雜情境下，行動主體如何回應這一世界遺產體制的影響。我們認為，人類學在新興遺產場域中，仍然必須兼顧「參與決策」與「參與觀察」兩種角色，不可因為側重遺產體制的政策介入，就放棄掉人類學長期以來的田野工作。特別是21世紀遺產場域的活動，是一種當代社會的新現象，絕非舊的行為模式之再生產。在這一意義上，人類學者理應運用學科典範的思想資源，投入各地的遺產場域，展開田野調查與觀察工作，以認識各地鮮活生動別有新意的實作經驗。

2008年7月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和馬六甲兩座城市，聯合登錄進入UNESCO的世界遺產地名錄（當地簡稱「入遺」）。針對這一個案，我們前

後有兩期到檳城進行調查。第一期為2010-2012年間，⁷觀察檳城在2008年名列世界遺產地後相關活動的開展，並蒐集1990-2008年間古蹟保存與修護運動資料，以及幾個重要的非政府組織的遺產行動，包括檳城古蹟信託（PHT）、社區文化藝術教育組織（Arts-ED）等。第二期為2015-2017年間，⁸繼續調查喬治市入遺之後的變化過程，並聚焦在地遺產工作者如何落實無形文化遺產的決策過程，包括2010年由檳州政府成立的喬治市世界遺產機構（GTWHI）的推動工作，以及前述幾個NGO如何與之合作的細節內容。

目前大部分無形文化遺產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傳統民俗活動的生產者、傳承者及其技藝、傳統儀式慶典的活動，以及作為活文化關鍵的民眾之日常生活的社群認同和文化再現等問題。例如Alessandro Testa（2016）反省從民俗文化到ICH的觀察、Carolin Bodolec（2012）研究中國剪紙從地方清單到列入UNESCO代表清單的過程、Kristin Kuutma（2013）探討ICH的傑作與代表性的問題、Marc Jacobs等人（2014）探討護衛無形文化遺產的行動者與經紀人的問題。臺灣《民俗曲藝》亦於2016年出版兩期專輯《無形文化遺產與地方社會》，發表不少探討巫師、儀式、祭儀、技藝、歌謠傳承問題的論文。

傳統技藝的調查與研究主題，在喬治市也受到大量關注。例如，世遺辦公室已出版系列讀物：《喬治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二十案例》*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wenty Practitioners*，介紹了打船錨、做金花、編藤、糊紙、戲班代理、武術師、波利亞歌舞、炒咖啡粉、雜貨店、旅社等傳統行業的創辦人或關鍵人物的故事；另有《檳城活遺產：喬治市的貿易遺產》*Penang's Living Legacy – Heritage Traders of George Town*；《檳城的戲曲木偶》*OTEHI – Glove Puppet Theatre of Penan*等冊頁發行。

根據我們多年的田調經驗，我們認為，當代人類學的遺產研究工作，還可積極拓展一種新的調查對象：ICH新場域的遺產中介者及其活動。

7 由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中心整合型計畫「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計畫」的補助，有機會前後三次在檳城進行初步田野調查：2011年2月、2011年7月、2012年6-7月。

8 因科技部計畫補助，於2016-2017年間再進行四次的田野調查。

ICH概念已經跳脫文化遺產的物質性觀念的束縛，由物品導向轉入過程導向，並在方法上從研究和研究人員，轉向展演傳統、創造文化的實務工作者（Aikawa-Faure 2009）與社群參與（Blake 2013）。這種新趨勢，深深符合人類學的傳統精神，重在把握在地觀點。然而，從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Latour 1991）來看，無形文化遺產的護衛，其能動者包括人與非人，而且往往是混雜主體，而非純化對象。

因此，本文認為，實務工作者不應只是傳統民俗活動的生產者或傳授技藝的老藝人等等，還應包括處在轉譯協商位置的遺產工作者。對於ICH護衛者的定義，應該從作為活文化主體的日常生活的民眾，擴展到遺產場域新形成的中介者與參與者。所以ICH的在地觀點，應該包括傳統定義下的「遺產承載者」與本文所主張的「遺產中介者」兩類。特別是後者，作為新的研究對象，其創造活動仍處在認識的空白地帶，我們尚無法充分說明其特性。選擇遺產中介者為觀察對象，是當代人類學遺產研究可以嘗試開拓之處。

下文將以我在檳城的觀察個案為例，說明當地遺產中介者對於ICH的在地定義、決策方向的擬定、遺產活動的安排與操作過程的構思等實作經驗。

三、喬治市ICH實作的觀察

從官方敘事來看，檳城喬治市與世界遺產的遭逢，可追溯自1991年左右，當時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UNCRD）在檳城舉行國際會議，相關官員與專家建議檳州政府保留文化古蹟。1995年州政府通過《古蹟保留指南》，規定市區指定範圍不能任意拆除，也不能興建高樓大廈。1998年檳城召開「指定馬來西亞文化與自然遺產名錄國際會議」，馬來西亞政府決定馬六甲與喬治市向聯合國申請世遺。2003年以馬六甲海峽歷史城市為題，向聯合國申請加入世界遺產地名錄，但因技術問題被拒絕。2004年馬來西亞政府成立文化及文物部配合申遺，2005年馬六甲與喬治市再度向聯合國申請。終於2008年申遺成功（黃木錦 201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08年審議通過這兩座城市登錄為世界遺產地時指出三項標準，其中第三點常被喬治市遺產工作者認定為與無形文化遺產有關。

標準（三）：馬六甲和喬治市，是歐洲殖民影響、亞洲傳統和多元文化遺產的活證據（living testimony）。這一多元文化的有形與無形遺產，被多樣地表達出來，包括不同信仰的宗教建築、族群街區、多語言、祭拜和宗教節慶、舞蹈、習俗、藝術、音樂、食物和日常生活。（UNESCO 2017）

這一普世地位的文化肯認，促使喬治市遺產工作者在2008年入遺之後，積極啟動ICH的實作，希望將無形文化遺產的觀念，具體落實在地方工作的推動上。然而，必須說明的是，檳城喬治市是被UNESCO登錄進〈世界遺產清單〉，並未有相關項目被登錄進〈無形文化遺產清單〉。但因為在其通過世界遺產地的登錄標準中，有提到無形文化遺產一詞，在地的遺產工作者便積極地將喬治市無形文化的保存，朝向符合UNESCO無形文化遺產標準的方向推進。他們以活文化（living culture）作為護衛ICH的關鍵，不斷思考如何保存ICH的問題，並展開了一系列的在地實驗。

其中最可體現這一創造性轉譯的，是地方遺產中介者自行摸索「無形文化遺產」的定義，並加以推動的實作過程。接下來，我們將以喬治市古蹟區進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2010-2016）」為例，說明遺產中介者如何藉由傳統老屋、傳統行業、傳統節慶的記錄過程，生產出一種可見的傳統生活想像。

（一）古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合作案（2010-2016）

2008年檳城被UNESCO劃進遺產區的範圍都在喬治市老區，包括兩個部分：核心區，109公頃，超過1,700多間建築物；緩衝區，150公頃，超過4,600多間建築物。申請加入世界遺產地名錄的過程，由NGO團體和州政府主導，然後再由中央政府代表向UNESCO申請。入遺之後，檳州政府成立專門的喬

治市世界遺產機構（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 簡稱 GTWHI）統籌相關工作，這一連結全球、國家與地方的樞紐機構，是我們觀察遺產中介現象的一個關鍵對象。

1. 從傳統老屋開始（2010）

2010-2016年於GTWHI擔任高階幹部的Tracy女士，⁹跟我們談到她就職以後在古蹟區設法推動ICH的過程。她回憶說：

那段時間是GTWHI剛剛好成立，有很多東西我們是沒有資料的。所以就盡量想出什麼東西，能把古蹟區管理得好。如果要把古蹟區管理的好，一定要有大方向的發展藍圖。那時候剛好因為燕屋問題，所以就做了area plan的development project（區域發展計畫），所以那個大方向是有了。然後，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檳州政府只是在鼓吹要怎麼樣維護那些有形的建築物，老房子。不過在另一方面，無形的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也是滿重要的。因為它是我們的三個OUV（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傑出普世價值）其中的一項。所以我就在想，要怎麼樣把ICH的東西做出來。¹⁰

不像有形文化遺產的保存工作，有可見而固定的古蹟建築物，可以具體登錄、修護和保養，無形文化遺產（ICH）由於太過廣泛，難以捕捉，該從何處著手，是一開始摸索的最大挑戰。喬治市早有多處空屋，很多轉為燕屋使用，對於這些有形建物維護的任務開展，剛好成為GTWHI開啟ICH實作的切入點。Tracy說：

因為我覺得ICH是滿重要的，我們只是有個空殼，不過沒有人住在裡面，真的是沒有那種靈魂在那邊！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做這個無形的heritage，比有形的更加困難。因為老房子在那邊，它不會跑

9 本文所引用田野報導材料，為顧及研究倫理問題，所有人名全部採用匿名方式處理。

10 2016.07.07訪談資料。

掉的。當然如果你沒有愛護它，就會慢慢地脫落，損壞這樣。不過無形的，你要怎麼樣去花心思，把人家的思想調整過來？無形的那個heritage，是一個真正的heritage在古蹟區裡面。所以那時候是滿新的，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這種ICH。¹¹

老屋若是沒有人，就變成了空殼，失去了靈魂。Tracy這個想法，隱含著以住戶的活文化作為老屋靈魂的比喻。這樣一種以靈魂為主體的投射方式，為遺產工作者打開一個想像空間，設想他們可以花心思，以空殼老屋為媒介，進行一種類似轉譯工作的思想調整任務。那麼，遺產中介者要如何才能找回所謂老屋失去的靈魂呢？Tracy想到的是以普查工作的方式，把ICH加以匯集整理。希望藉由勾勒傳統行業人物的具體形象，記錄老屋住民的實錄訊息，讓逐漸消失的老屋靈魂得以保存下來，以作為拯救傳統老行業的基礎。

2. 傳統行業調查 (2012)

為了能夠在社會脈絡中進行普查工作，GTWHI團隊委託檳城古蹟信託 (Penang Heritage Trust, PHT) 來展開調查。PHT是一個長期在檳城推動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NGO團體，於1986年成立，是喬治市申遺的幕後推手，由建築師、律師等專業工作者組成，早期以英語背景人士為主 (The Penang Heritage Trust 2018)。在1990年代就積極關注喬治市老街區的各種古蹟保存活動。2008年檳城入遺之後，更成為後來成立的世遺辦公室的顧問與主要行動者。

2012年PHT承攬了GTWHI「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合作案，調查經費由州政府通過GTWHI調撥。她們先舉辦工作坊，邀請世界文化遺產專家學者，協助定義其所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規劃根據古蹟區的老屋清單進行傳統行業普查。調查按照族群與語系的不同，分成兩組進行：一組負責馬來和印度社群，另一組負責華人社群，由精通漢語（包括潮州話、福建話、廣東話、普通話等）的Linda女士負責，沿著將近一百條老街、四千多間老屋，進行地

11 同腳註10。

毯式調查。她們以檳城在1969年以前是自由港的歷史為據，討論出要存在50年時間以上的老店行業，才能列為具有遺產價值的傳統行業。但現實上符合標準的留存店家實在不多，她們又根據稀有性與傳承性兩項原則，將時間放寬為25到50年之間，代表經過一個世代以上的歷史考驗即可。¹²

普查工作所面臨的挑戰，首先是問卷表格的設計。特別是高達四千多個樣本的調查，究竟登錄表格要如何格式化，才能既符合UNESCO的規範，還能將喬治市在地的多樣性給登錄出來？負責此項調查工作的Linda告訴我們，後來她設計出一套具有七種不同顏色的調查表格：白色的是基本資料，紅色的是住家資料，青色是傳統行業，紫色是手工藝，若是一般商業則使用藍色表格等。以這種分類方式，將日常生活的各行各業，篩選出一般意義上的商業，以及具有獨特價值的傳統行業、傳統手工藝與傳統文藝等類，分別調查登錄。¹³

完成表格設計後，Linda再訓練一批普查員，將四千多棟老屋進行分區，分配各組普查員一些地址門牌號碼，請他們去登門拜訪。其登錄程序，先記錄一些基本資訊，包括普查員姓名，該間老屋目前的空間利用情形、公司的中文名稱和羅馬拼音、創辦人、創辦年份、員工數、行業屬性、提供服務內容，再記業主的性別、族群、國籍、祖籍、語言、宗教信仰等資訊。然而，由於檳城多語言的使用情形，若碰上普查員與訪問者之間語言不通的情形，她們會調度具有良好漢語方言能力的資深普查員，再次進行拜訪，以求登錄資訊的完整性，避免因為語言溝通的不良，造成資訊的屏蔽。

3. 傳統節慶調查（2013；2015-2016）

2012年傳統行業普查項目之後，喬治市世界遺產機構（GTWHI）為了充分落實「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合作案的完整性，2013年再繼續委託PHT進行傳統節慶普查項目。賡續的登錄內容，仍屬於地毯式的普查項目，由主持人訓練大量普查員進行訪談。其中一位普查員Anthony先生，透過網絡科技媒體應徵而來。

12 根據2016.04.03訪談資料整理。

13 同腳註12。

相對於其他普查員的大專程度，Anthony由於曾在臺灣接受民俗學與民間宗教的大學和研究所的專業教育，在其協助傳統節慶普查工作時，便因為觀察與記錄能力的突出表現，很快升任協助Linda的資深調查員。協助過程中，他更意識到執行過程所碰到的問題。Anthony說：

2013年做計劃的時候，因為是從陽曆五月份做到November（十一月），所以她（指Linda）只focus（對焦）在這一些年度裡面發生的事情，也就是說從十二月到隔年的四月是被drop掉的，她並沒有派人去做觀察…她去找的那個人部分中，只知道說每年的幾月幾號要做什麼慶典，所以他告訴你大概怎麼做，但是他未必說得出所以然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就是，既然她沒有提出要解決的問題跟要討論的事項，它只是一個紀錄內容的東西……¹⁴

這當然與Anthony的專業背景有關。由於他對於宗教節慶的想像世界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認識，使其很快意識到普查方法的侷限，進而提出質疑與討論。所以當2015年GTWHI的高階幹部Tracy希望繼續深化ICH調查時，便是以專案委外方式，跳過原先委託的NGO組織，直接邀請Anthnoy負責展開傳統節慶第二階段的登錄工作與報告書寫，以解決之前普查時無法深入的問題。

從第一階段數千件案普查到第二階段深入活文化脈絡，是一項極其困難的轉譯工作。Anthnoy的調查策略，先根據2013的普查基礎，從中選擇眾多廟宇同時會出現的儀式，然後再進行深入調查，以捕捉存在於各種儀式活動中的一套知識模式。Anthony運用民俗學的專業，嘗試從複雜、量大、多樣的民間節慶中，捕捉出一套傳統地方知識，以作為深化無形文化遺產的登錄內容。因此傳統節慶的認識，不再是地毯式的分類數據而已，還要以為儀式活動作為傳統節慶的框架，再深入訪問展演工作實務者。Anthnoy所構思的傳

14 2016.04.10訪談資料。

統節慶的圖像，以展演儀式的實務者為切入點，記錄他們所使用的物品與條件，企圖從各種慶典活動中捕捉經常會出現的元素，尋找一套儀式舉行過程的知識模式。然後再以一種宏觀敘述，將古蹟區裡的傳統節慶，區分成慶典、節日、神誕、儀式、供品、酬神五個部分，完成調查報告書寫。¹⁵

4. 無形文化遺產清單（2016）

第一階段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2012-2013），是從老屋中尋找活文化，策略是將古蹟區裡四千多棟老屋的基本資料，進行普查登記，並區分傳統行業、傳統節慶、傳統文藝、傳統手工藝等。然而這些分類，是一種結構化的傳統生活範疇，並沒有建立屬於喬治市的無形文化遺產清單（lists of ICH）。由於ICH的實作越來越需要專業的從業人員，這項工作就從原本委託NGO合作或委外的模式，轉回到了喬治市世界遺產機構（GTWHI）本身。

2015年左右，GTWHI團隊聘請了好幾位受過人類學訓練的工作人員，其中一位畢業自臺灣人類學專業的專員Peggy小姐，於2016年建議團隊應該建立一份ICH清單，於是由她負責這項工作的推動。Peggy首先列出一些標準，用以判斷是否符合ICH價值，然後規劃如何記載ICH的內容、地點、人物等項目。然而Peggy碰上了人力不足的困難，因為在那期間，機構只分配她一個人力來負責這項工作。此外，還存在另一個更棘手的困難。Peggy說：

我在2012年的list（清單）裡面我看到它，2016年它沒有了……它以前整條街都是美髮院，那美髮院後來消失了，整條街都變成裁縫店。然後裁縫店之後還會再消失，最近就是越來越多賣批發女性服飾的。那美髮院移去哪裡？或它真的就沒有了？然後，還有就是裁縫店，通常會搬到哪裡去？¹⁶

Peggy比照2012年傳統行業的調查紀錄，發現到2016年已有大量搬離古蹟區或消失，例如美容院、服飾店與裁縫店等。這一現象，凸顯出遺產工作者

15 根據2016.04.10訪談資料整理。

16 2016.07.02訪談資料。

在ICH檔案化過程中，會不斷碰上的瓶頸，那就是傳統文化的流動與消逝的挑戰。

(二) 討論：ICH「再現」問題的釐清

從上述喬治市古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合作案，我們可以看到地方遺產中介者對傳統老屋、行業、節慶進行文本紀錄的檔案化，以回應世界遺產體制的ICH理念。其中，出現了一些值得進一步反省的問題。

1. 搶救思維與檔案化的侷限

喬治市世界遺產機構檔案建立的目的，從其發軔之初，就是為了提供下一階段拯救老行業之用。可是，這種搶救思維運作的結果，與二十世紀初期人類學在世界各地搶救原住民文化所進行的民族誌研究一樣，都有如Michel Foucault (1963) 所提的現代臨床醫學觀點，是一種經過資訊蒐集、科學檢驗，然後判斷病症的規訓操作。

這種對於消失文化的診斷與處方，事實上是一種鄉愁主義者的立場與行動。近年來提出鄉愁人類學的比利時學者David Berliner (2015)，就表示人類學者向來是文化消失的診斷專家，消失文化就和人類學一樣古老，都充滿鄉愁。他指出，在今日的全球化趨勢下，各大國際組織如UNESCO的各項政策，特別是ICH的典範，其實構成了一種世界性診斷文化傳承危機的制度回應。

可是，因應文化消失的危機時，常見的官方策略往往採取的就是大型登錄操作之類的文化工程 (engineering)。全球各地的遺產行動者，被要求依據操作指引，生產大量檔案，編列清冊 (Kuutma 2013b : 5)。檳城遺產工作者正是遵循全球遺產體制的指引，積極進行ICH的資訊調查和清冊登錄工程。

喬治市列入核心區和緩衝區的老屋超過四千間，以老屋為載體的傳統行業調查的檔案化，因為量體大，檔案材料的取得，便需要大量調查員的培訓和按表登錄的制式操作。而他們根據UNESCO三項傑出普世價值 (OUV) 標準，為每間老屋及其行業特徵拍攝圖像，將老屋的傳統行業登錄在清單表格，卻讓多樣的活文化變成一種固定檔案。這一問題，在第二階段登錄工作

立刻被曝露出來，才幾年時間，很多普查資料又出現與現實不符情形，傳統行業持續移動消失。而清單模式卻很難記錄其流動狀態。

喬治市ICH的實作困境，我們認為乃是受制於古典「再現」（representation）認識論的侷限。不少遺產工作者，由於難以逃脫物件體制的本質化制約，很容易就會將ICH的護衛行動，誤認為是保存一種過去的真實，並相信清點事物、建立檔案、建立清冊，就是一種留下歷史證據的制度化過程。可是，作為無形文化遺產的活文化，是不可能經過清單的再現形式獲得原真性的。

清點（inventorying）工作，乃是一種默認的分類行為。而如Antonio Arantes（2009）所言，分類行為乃是根植於西方思維的一種文化偏見。事實上，人文科學近十幾年的討論已清楚指出，正是西方古典時代分類知識造成了事物命名與同一化代表的再現問題（Foucault 1966；Hooper-Greenhill 1992）。¹⁷不過，我並不是說，無形文化遺產的工作，需要放棄「再現」邏輯的操作，只是這一觀念的認識，需要重回ICH護衛觀念的本質進行討論，才能適當使用。

2. 走出ICH護衛觀念的困擾

檢視UNESCO無形文化遺產觀念的變化過程，我們看到，從九〇年代挑戰民俗、傳統、大眾等文化概念的不足，希望超越物質文化與文化認同的二分，到後來的「非物質文化」再到「無形文化遺產」，已幾經轉折。而2003年通過ICH公約，更從「保護」（protection）、「保存」（conservation）等概念轉為「護衛」行動（safeguarding）（Blake 2013）。但要如何在活文化的脈絡中，讓「護衛邏輯」取代「保護邏輯」呢？這是一場開放的試驗。ICH理念本身的不確定性，使遺產工作的實務與理論都面臨新的挑戰。比利時自

17 Michel Foucault（1966）將認識結構（Structures of knowing）分成三種知識型（épistèmes），文藝復興的、古典的、現代的，三者有著不同的思考邏輯，分別是相似（similitude、resemblance）、分類、生命。Eilean Hooper-Greenhill（1992）採用Michel Foucault的知識型觀念來解釋博物館的知識形塑，指出博物館史從早期奇珍異室以相似方式秩序化收藏物件，轉到之後以分類方式秩序化收藏物件。這一運作結果，造成博物館的從業人員，陷入了分類的命名與同一化代表的再現問題。

由大學人類學者Chiara Bortolotto (2011 : 21) 就曾專文分析無形文化遺產觀念造成的困擾：

無形文化遺產，作為最新出現的遺產觀念，可能也是最撲朔迷離、最令人錯愕的一種。這一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引入的新範疇，擾亂了歷史上一直是建基在「物件體制」(régime d'objet) 之上的遺產領域：各類遺產機構都很難構想遺產的非物質向度，將其整合進自身的組織之中；而充分考量遺產的社會價值，作為無形文化遺產護衛政策的真正關鍵，也不屬於遺產專業人士的科學與技術能力範圍。如果說，無形文化遺產的興起，向文化政策的執行負責人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問題，遺產理論家則紛紛批駁其概念侷限，認為這一觀念純屬一種「智性荒謬」，只不過是Henri-Pierre Jeudy (2001) 所謂「遺產偏執」(L'obsession patrimoniale) 的最新畸變，困擾著當代社會非把現在消解進一種「永恆的回溯」(rétroaction perpétuelle) 之中不可。」

脫離「物件體制」的遺產觀念，對長期以「物質性」為基礎的遺產實務和理論工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如果ICH要護衛的不是民俗和傳統，不是要在一種博物館化的空間中對活文化加以「保護」和「保存」，那麼在開放的社會空間中，如此高度動態化的文化表達，又怎樣才能實現其制度性的「護衛」，而又避免被僵化為制式管理呢？要能走出ICH護衛觀念的困擾，其實涉及的是要如何重新理解ICH觀念之「不確定性」所開啟的可能，而其中的關鍵，正是ICH「再現」問題的釐清。

3. 人類學將ICH視為「再現的競技場」

事實上，國際人類學和民族學學會(IUAES)在2010年12月成立無形文化遺產委員會之後，便積極進行學術網絡的強化交流。2012年2月該委員會於國立墨西哥大學舉行第一屆研究規劃會議，就無形文化遺產的一些關鍵議題，進行一般性的討論，其中便包括「再現」議題。人類學者在該交流會議

上，將無形文化遺產理解為人民的再現、他們對自身的再現、對再現的再現的再現等等，因此無形文化遺產必須作為「一種社會和象徵再現的競技場」

(an arena of social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來理解，而且具有內在雙元性，包括觀念再現與實作、象徵與表現、現象學與鮮活的表達 (Arizpe and Amescua 2013 : 125)。這表明當代人類學者的無形文化遺產視野，其實已放棄「代表整體」的古典再現觀點，而強調其在觀念層次與實務層次之間的展演競技。這使得ICH的護衛行動，變成一種旨在呈現歷史文化元素之遺產價值的「設備裝置」(device)。

這些關於ICH作為「再現競技場」的人類學討論，無疑是細緻深入且富有新意的，但是大部分的地方行動者在實務中仍繼續採用「代表整體」的古典再現觀點，將ICH的護衛行動化約在代表人物或集體表徵的象徵向度，忽略了實作表現的另一個向度。這個後果，制約了當前對於ICH護衛行動中創造力的理解。

事實上，如前節所說明，2001年的Turin會議，對於ICH的定義，就強調無形文化遺產是一種創造力，要護衛的對象也是創造力。因此ICH的護衛重點，就不再是不斷再現的代表產物，而是不斷再現過程中的創造力。Lourdes Arizpe，作為IUAES無形文化遺產委員會的主席，在墨西哥大學交流會議之後，亦繼續就這一課題提出了「文化工地」的觀點 (2015)，強調無形文化遺產的護衛是不斷刻劃的過程。然而這個創造性的過程究竟是如何運作的？Lourdes Arizpe並沒有進一步提出方向。這正是本文下一節的重點。誠如我們在前節所提，人類學者在當代遺產變革中的新角色，除了參與決策之外，還需要擴展一種觀察中介者的新任務，以彌補我們對其創造活動認識空白的問題。

四、朝向一種想像人類學的遺產研究

如何走出無形文化遺產作為象徵再現的侷限？如何強化對實作表達的關注，以理解護衛行動中的創造力？我們認為需要一種「想像轉向」的思考，

來觀察遺產中介者的想像活動。這是一個極其困難的挑戰，然而當代人類學關於想像研究的思想資源，無論是認識論或是方法論，都可以在此發揮作用。

(一) 想像轉向：從「文化再現」到「人類想像」的典範轉移

人類學對於想像力的觀察研究，早在1990年代便有James Preston提出了一種系統性的分析框架。在談論人類學與想像力的論文中，他指出想像是思考他者的理想媒介，但人類學一直避免將想像作為一個中心議題。為了探究不同人群的想像領域，他在十多年的田野調查中嘗試各種方法，以深入瞭解報導人的想像世界。James Preston根據他的研究經驗，將想像劃分成空間、時間、型態、理解等四種領域，每種領域再細分幾種特性，以提供想像研究的分析參照（Preston 1991）。

有別於法語學界於二戰之後就湧現一波想像研究的發展，¹⁸英語學界要到1980年代才積極跟上「想像轉向」的熱潮。這當然與1980年代所出現的「再現的危機」（Clifford and Marcus 1986、Geertz1988、Clifford 1988）密切相關，這一波奠基在文化書寫問題上的後現代論戰，不僅使得人文學科發生認識論的轉移，也讓方法論出現重大革新。例如，Nigel Thrift（2008）提出「非再現理論」的觀點與核心原則；¹⁹Phillip Vannini（2015）進一步提出「非再現理論」的調查指引。Tim Ingold（2011）則將非再現的方法論與想像力的觀察放在一起思考，他以畫魚為例，指出大部分的繪畫都是畫出圖像的再現，這些輪廓線條封閉了軀體，呈現一種存在式的靜態元素，只能畫出死亡。然而魚的真實身體，是對生活世界開放，在水中游動，而不是封閉在自身內部。因此他認為，劃出一種像鋸齒形狀的線條畫法，才能表達出有生命的魚在水中上下游動的動態歷程。

18 法語人類學界對於想像的研究，因為受到Gaston Bachelard和Jean-Paul Sartre的影響，早在戰後就已出現大量研究成果。例如Edgar Morin（1951, 1956）、Henry Corbin（1958）、Gilbert Durand（1960）。

19 Nigel Thrift（2008）《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Space/ Politics/ Affect》，已經勾勒出「非再現理論」的七種核心原則：每日之流、實作在場、展演、物質、更新激化、身體情感、倫理。（2008：3-6）

正是以「非再現想像力」的討論為基礎，Tim Ingold才能在2012年主編的專書中，提出想像地景（imagining landscapes）的觀念。在該書導論中，他就空間知覺的問題，提出「想像就是一種活著（imagining is being alive）」的觀念，將知覺和想像力（imagination）的問題，整合在一起思考。他指出，所謂的感覺，正是想像力的工作，是行動者去參與自我在世界當中的知覺製作。他對照兩位藝術家觀看地景的不同想像模式：René Magritte（1898-1976）在「人類處境」（The Human Condition）的超現實畫作中，透過窗戶觀看遠方的地景繪製，是一種外在於人，處在眼睛遠端的那一邊，經由觀看者內在精神的想像過程而再現的；相對的，Richard Long（1945-）的大地藝術作品，則是他直接走進地景中，來回行走，最後形成路線軌跡的地景圖像。Tim Ingold表示，《想像地景》Imagining Landscapes（Janowski and Ingold 2012）作者們的觀點，與René Magritte相反，比較像是Richard Long的觀念，因為對他們而言，想像力是這樣被定義的：

「如果說想像力是一種心智的工作，那麼這種心智並不是一種遠離世界的超然，包裹在自我生成的思慮中，而是一種自由地與世界交融，並且是沿著多條感官參與路線而形成。」（Ingold 2012：16）

想像力的活動，因此不是一種封閉的沉思，而是一種在人與環境的動態關係中所創造出的靈活知覺。Tim Ingold對比René Magritte和Richard Long來解釋想像地景的環境觀點，我們認為可以適當對比博物館想像與遺產想像的差異。博物館研究，基本上以物件為中心，從物質文化的認識開始；博物館物件提供的想像，乃策展人將視野框架設定好擺置在固定位置，讓觀眾有距離的超然觀看，如同René Magritte在「人類處境」的觀念。相對的，遺產研究由於具有空間屬性，本質上就屬於一個文化地景的問題；因此，遺產場域的想像，由於需要納入活文化的護衛原則，已經不可能是一種客觀化的內在精神的再現，而是在遺產場域中，如同Richard Long的觀念，沿著多種感官行走，所發生的一種與活文化世界交融的想像活動。

以喬治市ICH的實作經驗觀察，我們發現，想像力在遺產活動中，的確

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藉由遺產中介者所實踐的走動式案例，我們希望進一步說明一種想像人類學遺產研究的可能。

(二) 想像力的作用：走動式的體驗案例

2001年成立的「社區文化藝術教育組織」(Arts-ED)，是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NGO團體。訴求對象以城市和郊區小孩為主體，通過藝術創意來詮釋文化遺產，讓跨族群的青少年在社區融合習得多元文化。在成立之後，Arts-ED陸續推動一些計畫，包括2001年在喬治市「城市小孩計畫」、2006年走入郊區「我的浮羅山背計畫」、2008年於喬治市「Campell市場文化繪圖計畫」、2009年「歡鬧古蹟嘉年華」、2012年再到郊區「我的雙溪檳榔」計畫、2015年「和諧之旅計畫」、2016年郊區「北海計畫」等。我們將以2009年「Campell市場文化繪圖計畫」、2015年「和諧之旅計畫」為例，說明她們帶領年輕世代走入社區、體驗傳統所採取的想像策略。

1. 走入傳統市場：文化繪圖計畫 (2009-)

喬治市古蹟區從前大約有八、九座傳統市場，當地人以馬來語稱作巴剎。例如Campell、吉靈萬山、社尾萬山等巴剎。這些場所匯集了來自喬治市郊外及馬來半島的生鮮用品，也包括來自東南亞區域、印度、中國和西方各地的物流產品。然而作為批發市場龍頭的社尾萬山巴剎，在世紀之交便因檳州州政府推動〈光大計畫〉而在2001年被迫搬遷。2008年喬治市成為世界遺產地，來自各地資金更是大量湧入，傳統市場陸續被拆除到只剩下兩座，這引起NGO團體的關注。Arts-ED於2009-2010年在喬治市古蹟區推動市場文化繪圖，正是在這一條件下的構想。當時檔案指出：

2008年喬治市獲得UNESCO提名，便立刻面對都市再生和資金湧入的挑戰，但登錄亦鼓舞更多對活文化和物質修護的保存效應……傳統文化地點，例如市場，正面對超市商店到來的威脅……呼籲進行市場地的文化繪圖，將可以幫助理解地點的目前使用情形、使用社群、地點對使用者的意義等等。(Pillai 2013: 45)

Campell街巴剎是一座位在喬治市世遺核心區的傳統市場，是勞動階層日常使用的熱鬧場所，迄今每天清晨仍有現場的生鮮宰殺活動。Campell街市場文化繪圖的執行經驗，讓Arts-ED團隊體認到，藉由帶領成員進入傳統生活的重要場所，對其社會機能與生命故事加以描繪記錄，可以達到活化認識一個地方的各種文化元素、意義和特點的效用（同上引：43）。

他們先組織運作團隊，選擇共同參與伙伴，招募成員以NGO、志工和學生為主。然後，思考如何把市場地點的歷史意義給繪製出來。首先，是從記錄市場興建與發展過程的歷史開始，包括土地使用史與歷史建築等材料，並同時調查在Campell市場經商擺攤的社群檔案。在完成基礎資料的調查後，他們著手進行整合，繪製市場地點的商業、社會和宗教意義：（一）商業意義：描繪記錄濕貨、²⁰乾貨、雜貨、熟食等商業活動的內容，以及這些商業功能在不同時段的使用位置；（二）社會意義：描繪記錄不同族群在市場的使用空間範圍，以及商店、攤販、鄰居、朋友等買賣交易、相見聊天、互動交流等不同社會活動的使用位置；（三）宗教意義：記錄中元節、歲時祭儀、神明慶典等等宗教活動，在市場周遭街道和建物內部的使用位置。在完成文化空間的繪製之後，再進一步以產品為中心，繪製市場商品和物流服務的文化和經濟意義；（四）經濟意義：繪製記錄市場所提供的服務內容、技術和知識；（五）文化意義：則整合前面各項意義，進行整體文化特性的評估。最後Arts-Ed的創辦人Janet Pillai將Campell的案例，寫成一本專書手冊，用以長期推動喬治市各個遺產地景的文化繪圖的普及工作（同上引：47-91）。

文化繪圖的想像過程，需要工作者走入社區，進入在地脈絡，捕捉存在其中的活文化圖像，再以繪圖方法整合定位。文化繪圖作為一種認識活文化的方法，一旦熟悉之後，就成為喬治市遺產工作者的想像工具，在各種遺產場域中，均可加以推廣使用。例如，喬治市每年七月舉行的世遺慶典的籌畫，便會向民間團體引介文化繪圖的使用，鼓勵他們走入自身社區的脈絡去尋找自己想要學習的師傅，並繪製屬於自己社群的傳統技藝地圖。而Campell

20 濕貨，指的是生鮮或剛屠宰的魚、肉等；乾貨，指的是肉乾、香菇等風乾物件。

街市場文化繪圖的成功經驗，也讓Arts-ED這幾年持續與相關單位合作，協助執行文化繪圖工作，例如〈吉靈萬山市場〉、〈北海〉等案子。Arts-Ed工作者，以他們對於藝術教育的熱誠，不斷帶領年輕人進入傳統市場，並引進藝術家進入市場的培訓計畫，促成他們與市場攤販互動，激發新的意義，讓傳統市場成為一個新的文化元素的創造地。

2. 走入傳統老街：口述史計畫（2013-）

有了文化繪圖經驗的積累，Arts-ED一位工作人員Fanny女士，畢業自檳城的理科大學研究所，亦培養出自己獨立接案的能力，成立文史工作室，協助喬治市世界遺產機構（GTWHI），執行更深入的生命史計畫。她採用的策略，即是以文化繪圖的方法為基礎，製作推廣繪圖手冊。

事實上，GTWHI在與PHT於2012年完成「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合作案後，領導幹部Tracy曾希望將這些成果，以視覺表達方式傳播給更多人知道。因此，Tracy便委託Fanny為GTWHI的入遺慶典，舉辦一場為期三天的「喬治市活寶」（Living Museum）活動，用三個月的籌備時間與老居民訪談；第二年的「喬治市活寶」計畫（2013），Fanny再對焦傳統行業為主題，讓主人翁親自敘說自己的故事。為了讓這些紀錄可系統保存下來，Fanny主動拜訪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口述歷史中心（Oral History Cent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HC），由中心協助GTWHI在2013年進行首個口述史計畫，並為招募的口述史採訪團隊，免費進行短期培訓和技術支援。

這就成了後來的「走入老街」（Oral History Documentation Project : Cherita Lebu Chulia）計畫。主持人Fanny以尋找散失的老檳城精神為主題，嘗試讓普查分類的檔案材料，復返原來所在地方，以呈現活文化的樣貌。可是在古蹟區的眾多老街中，要從哪條街著手？椰角街（Pitt Street）、土庫街（Pantai Street）、牛乾冬街（Chulia Street）、萊特街（Light Street），是檳城四條最古老的街道，Fanny和計畫夥伴依據歷史價值，選擇其中族群最多樣的老街（牛乾冬街）切入。²¹訪談對象以2012年GTWHI委託檳城古蹟信託進

21 根據2016.04.08訪談資料整理。

行的非物質文化普查檔案為據，盡量涵括不同區段、性別、族群背景，去收集老街居民在1970年代前的生命史敘述。

「走入老街」計畫，正是Fanny根據之前在Arts-Ed所習得的文化繪圖策略，以十個人物形象的生命故事，作為地方歷史敘述內容，再以摺頁畫冊的繪製方式，呈現一種具有視覺閱讀效果的文化空間感。而且，遺產中介者不只是走入老街進行深入訪談，完成摺頁繪圖檔案而已，為了實踐無形文化遺產活文化的理念，Fanny在完成生命史的調查計畫後，還於老街舉辦展覽，讓離街居民復返老街，以活化社群對於老街的歷史記憶。而在2014年出版《走進老乾冬》繪圖本後，Fanny再於GTWHI資源中心「每月一書」(Books of the Month programme)的「說書系列」(Talking Books)，將繪本製作的理念與過程跟大眾一起討論，分享故事集裡的回憶。²²這些行動，讓老街的傳統想像，成為一個在檔案文本與在地場景之間，不斷來回呼應表達的文化生產過程。

3. 走入宗教場所：和諧之旅計畫 (2015)

喬治市遺產工作者，除了走入傳統市場與老街等日常生活的世俗場域之外，又是如何進入宗教場所的神聖場域，轉譯為普世價值的地景想像？在此，我將以椰腳街的宗教漫步事件為例，加以說明。

檳城喬治市椰腳街 (Jalan Majlis Kapitan Keling)，²³由東往西，貫穿經過各大族群的宗教聖殿，包括：英殖民時代興建的聖喬治教堂、華人的廣福宮觀音亭、斯里瑪哈瑪麗阿曼印度廟、印度裔的吉寧清真寺、馬來人的清真寺。2015年由「社區文化藝術教育組織」(Arts-Ed)與Think City，在椰腳街共同舉辦了一場名之為「和諧之旅」(Street of Harmony)活動，主辦單位並特別強調椰腳街匯集了四大宗教禮拜場所。

Think City機構的背景有必要介紹一下。它是馬來西亞政府國庫基金，

22 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d 2017 Books of the Month programme. <http://www.gtwhi.com.my/educate/oral-history-documentation/cherita-lebuh-chulia-2013-blog.html>. Accessed July 1.

23 由於檳城屬於英國殖民城市，街名主要以西方人名與英文用語為名，但華人很早就有一套自己的街道命名系統，幾乎每條街都有漢語書寫的地名用語。

因應馬六甲和喬治市入遺，於2009年成立的國庫控股子公司。由於馬六甲州政府與中央政府當時同屬執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國家基金便直接撥款給該州政府使用。相反地，檳城乃反對黨民主行動黨（Democratic Action Party）執政，而且喬治市有超過七成的華裔居民，因此國庫基金並沒有將經費直接撥給檳州政府控管，而是交由Think City負責喬治市古蹟維護與管理基金的分配與執行。「和諧之旅」便是由Arts-Ed與Think City合辦，推出導覽手冊，在喬治市旅遊中心、咖啡館及酒店免費索取，希望讓市民和遊客可以漫步在宗教場所。

「和諧街」代表族群融合的象徵意象，是2008年喬治市列入世界遺產地時，獲得UNESCO評審委員肯定多元文化共存的一個關鍵理由。這一活動的推廣，表面上看自是正當合法，並獲得來自檳州政府官員與國家相關補助機構領導的讚賞。不過對於在背後推動的遺產工作者而言，卻是經過長期努力克服萬難，轉換宗教想像的解釋形式才達到的成果。這一過程，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容易單純。事件的發展，得從十年前的脈絡開始談起。

2004年在馬來西亞檳城舉辦「世界宗教、普世和平、全球倫理（World Religions-Universal Peace-Global Ethic）」展覽，激發出馬來西亞有關宗教多樣性、多元文化與民族要如何和平共存的討論。受到這波全球化宗教倫理觀念的影響，檳城相關NGO團體，²⁴積極構思如何在島內推動相關工作。他們認為檳城老城區的椰腳街，由於容納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宗教場所，可讓各種背景的人一起了解宗教傳統如何和平共處。因此這些團體在2006年發起「檳城全球倫理計畫」（Penang Global Ethic Project），舉辦一系列講座、論壇、旅遊與展覽，希望將椰腳街展示為「和諧街」（Street of Harmony），以此和平意象，界定檳城具有宗教寬容的城市形象。²⁵

在這一契機下，檳城幾位建築師和遺產團體，²⁶進一步合作製造了一份與

24 包括Arts-ED、檳城古蹟信託、Malaysian Interfaith Network、The Penang Teachers' Art Centre等，以及理科大學和幾個官方機構。

25 The Penang Global Ethic Project 2016 George Town, Penang—A Microcosm of Unified Diversity. <http://www.globaleticpenang.net/index.htm>. Accessed September 20.

26 包括Lestari Heritage Network、Goh Hun Meng、建築師陳耀威等人。

現實並存的「世界宗教漫步」(World Religions Walk)的虛擬導覽地圖，提供有興趣的人進入數位化網站觀賞。²⁷另一方面，檳城古蹟信託(PHT)亦開始定期舉辦現場導覽活動，規劃宗教漫步路線，²⁸Arts-Ed亦參與這項宗教漫步計畫，合作推動年輕學生走進古蹟區的遺產漫步活動。PHT專員Gabrielle回憶當時的執行過程：

當時Arts-ED有在走這樣的活動，一個純粹的Heritage walk (遺產漫步)，就是漫遊在這個市區，只是針對學生……老師其實一開始是蠻抗拒的，當我們推廣這個heritage walk，老師都講，我沒有時間帶我的學生出來……我們去學校給講座，過後當然就有很多老師講好好，不如我們把學生們送去市區。老師們反應還不錯……而且那個時候，Heritage walk跟我們普通做給遊客的不大一樣，這個heritage walk完全是針對他們在學校教的科目而設計的，所以我們有heritage art walk (藝術漫步)，就是用arts這個科目。學校教的arts是用線條，那麼我們就用建築來講線條。當然我們也有geography walk (地理漫步)，我們就開始強調說，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移民者，為什麼華人要來，馬來人要來，印度人要來……還有history walk (歷史漫步)，是配合著他們的課本。例如，走去看Francis Light怎麼開發這個地方，因為這個都是書本上沒有的。²⁹

雖然宗教漫步與遺產漫步的理念非常好，並深化到藝術漫步、地理漫步、歷史漫步等不同面向，卻遭到了伊斯蘭教徒的反對，甚至將戰場轉到教育局的公權力干預，由官方禁止學校讓學生參與這樣的活動，最後逐漸沉寂

27 The Penang Global Ethic Project 2016 World Religions Walk- Penang, Location Map. http://www.globalethicpenang.net/webpages/act_02b.htm. Accessed June 25.

28 包括檳城博物館、1786年成立的天主教堂、1818年興建的聖喬治教堂、Durga印度廟、觀音亭、Sri Maha Mariamman印度廟、潮州會館的韓江家廟、Nagore印度穆斯林殿、印裔的Kapitan Keling清真寺、葉宗族公司家廟、邱宗族公司家廟、馬來人在亞齊街的清真寺、檳城伊斯蘭博物館等。

29 2011.02.16訪談資料。

下來。2008檳城入遺之後，又再度有人提出和諧街計畫，再加上當時印度前總理來訪參觀，實際行走椰腳街，並寫了一首有關和諧街的詩，讓這一論述重被談起。然而，囿於宗教在馬國的敏感性，和諧街的形象製作仍然受挫，包括檳城州長、官員、議員，仍都不願接受各種公開在椰腳街行走的活動邀請。

儘管如此，Arts-ED和檳城古蹟信託在這段沉寂時間，仍然不懈地在古蹟區進行導覽，只是不再多提和諧街論述，而是稱之為早期聚落漫步（early settlements walk）。透過聚落漫步，讓學生參觀不同場所，宗教場所只是其中一部分。不再特別聚焦宗教，而是強調歷史故事、社區凝聚等，讓整個導覽路線的定位，安排在比較安全的層次，以遺產概念替代原來的宗教概念。在新的定位之下，再加之喬治市列入世界遺產地，教育局才重新允許每間學校十位學生參加遺產漫步活動。³⁰

一直要到2014年，Think City才企圖再度活化「和諧街」概念，並找到Arts-ED合作，希望賦予一種新的意義。協助製作〈和諧之旅計畫〉摺頁的Fanny回憶這段過程，表示經過上次的挫敗經驗，Think City這次特別強調，需要反省先前沒有和社區人溝通的問題。他們努力和五大宗教場所的委員會互動，詢問宗教社群自身如何理解「和諧」的想法。結果，遺產工作者還是觸礁了。因為對於宗教團體而言，和諧街的概念仍然是不存在的。不過經過問題的討論，她們終於意識到，宗教漫步之所以走不動的原因，乃是不同宗教之間是不能被和諧的，因為每個宗教都認為自己是獨特的。³¹

後來的解套策略，Fanny說，是他們決定放棄追求「宗教和諧」的目標，擱置「信仰內容」的執著，藉由蒐集五大宗教場所對各自宗教基本形式的條列清單，篩選歸納出水、光、月和花等四種自然元素，作為喬治市椰腳街不同宗教場所的共同元素。³²結果，一種詩學形式的宗教想像機制，在腦力激盪的討論中被構思出來。作為遺產的宗教想像機制，他們要求先承認水、光等

30 根據2016.04.08訪談資料整理。

31 同腳註30。

32 同腳註30。

是各大宗教儀式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因為所有宗教都以水來進行靈魂淨化，以光來象徵神明上蒼等等。然後，才由Arts-Ed等遺產工作者，將五大宗教場所對於四大自然元素的獨特敘事內容，配合各種象徵圖像的專門使用，以文化地圖的空間表達形式加以繪製，創造出〈和諧之旅〉的新解釋模式。

4. 走動路徑的創生：遺產漫步

Arts-Ed作為喬治市重要的遺產行動單位，2000年創辦宗旨即是讓兒童在社區脈絡中習得藝術。她們先進入學校，帶領學童接受課本之外的藝術教育，然後帶兒童走出學校，進入社區場域，通過創意藝術來詮釋遺產。因此早在喬治市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地的過程中，她們就積極推動遺產漫步的活動。Arts-ED的專員Isabel小姐說：

這種漫步，一開始我們的計劃裡面，有一種叫guide walk（導引漫步），基本上是你一定要親身體驗，然後要徒步走。這guide walk是有一個設計的路線圖，裡面是有很多不同的主題……一開始，2005年大概，裡面的主題有些是地理，也有歷史，是從學校那邊，可是他的地方是整個圍繞在這個core zone（核心區）……就這麼多年一直走。³³

所謂的徒步行走，究竟是甚麼意思？除了親身體驗核心區的傳統生活外，路線的設計就是要讓學習者研究地方，在老街區與人接觸，邊走邊蒐集材料資訊，然後看見一個整體。學員在出發前需要先做功課，在走動過程中，不是被動地跟隨解說員聽講，而是要主動地去尋找證據。行走時協調員會不斷引導學員提問，縱使看到最簡單的例如傳統食物，也會請他們問些最基本的問題。例如問清楚「裡面會有什麼？」然後回來跟同伴一起進行群組討論，再引導他們繼續思考，「如果這是其中一個傳統行業，那傳統行業從哪裡來？」假設他們的回答是從人而來，那麼會再引導學員繼續提問，「這

33 2017.01.17訪談資料。

些人是從哪裡來？」³⁴等等。行走活動因此構成一個連貫性的引導過程，讓參與者最終自己形成一種遺產想像。

路線導引，不是單純從一個點到一個點被動跟隨行走，也不是單純地接受訪談者提供的訊息。從行走體驗、蒐集證據到遺產想像的導引過程，是一整套為走入社區而展開的「遺產漫步」行動方案，這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就是要讓年輕世代可以形成自主判斷，實現文化永續的目標。為此，Arts-Ed的工作人員希望讓學童從「路線接受者」變成「路線規劃者」，啟發他們擔任設計者的想像能力。此外，她們還藉由推動戲劇表演，讓學童扮演在街道市井所聽到的人物故事，轉換位置，透過角色扮演，設身處地想像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與宗教生活。Isabel講到：

比如其中一個，以前那個作皮影戲的，他們其實是去問到葉氏宗祠，有一個孩子被中邪，然後他來葉氏宗祠拜拜後，因為那個神保護他。我們的孩子都是不同族群的，可是他們選這個故事作為他們要表演的故事……我覺得我們是很開放式的討論，甚至是馬來學生，伊斯蘭學生，那個學生穿的是佛教的服裝。所以當他穿的時候，大家都明白，這麼穿是什麼宗教。然後他還是很理性，他知道，我現在扮演的角色是一個演出者，我做這個是因為這個佛教會以這個角色，站在這個族群，他們應該是用這個方法來驅邪。³⁵

Arts-Ed作為我們觀察所見喬治市最有活力的NGO團體，對檳城多元族群的遺產想像，並不是採用一種分類的、本質的、靜態的封閉性文化再現模式，她們藉由文化繪圖的想像工具，在地展演的藝術手段，陪伴孩童青少年走進社區，尋蹤探路，學習判斷，從而激發他們對地方傳統生活的想像。這種長年積累之下不斷行走的活動，已在喬治市開拓出各種充滿想像力的學習之路。

34 根據2017.01.17訪談資料整理。

35 同腳註33。

五、結論：遺產想像觀點的提出

隨著世界文化遺產體制的形成，及其理念在全球各地的實踐，遺產研究日益勃興，並因學科旨趣與研究立場的差異，產生了多種不同的研究取向。但無論是保守回歸或激進運動、時間過程或空間景觀、唯物論或價值觀等研究取向，本文認為，都無法充分解釋我們在檳城多年觀察遺產中介者的實作案例，特別是無形文化遺產的創造活動。我們因此嘗試提出一種朝向想像人類學的遺產研究新取向，並在論文最後具體闡述「遺產想像」的三個觀點。

（一）想像工具：「復返」傳統「脈絡」的方法

脈絡（context）是Clifford Geertz詮釋人類學的核心概念（1973），也是很多人類學者進入田野工作的認識依據；復返（Return）則是James Clifford的批判人類學所提出的新方向。³⁶那麼，對於既非純粹現時（present）又非徹底過去（past）的活文化傳統，特別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無形文化遺產，又怎麼可能進到「脈絡」、「復返」原初呢？

透過本文研究分析喬治市遺產中介活動，我們發現一個重要的環節，就在於想像力在遺產場域可能發揮的作用。Arts-Ed推動的走入傳統市場、走入傳統老街、走入宗教場所、遺產漫步等活動，在我看來，其實就是在激發一種「復返」傳統「脈絡」的遺產想像。

「復返脈絡」作為想像方法，首先是在〈文化繪圖〉活動中得以實踐。「文化繪圖」本是UNESCO建議遺產工作者具體操作無形文化保存的一種重要工具，有著詳細的定義、理念目標、操作程序和手冊，希望讓無形的知識、人群、歷史等變得可見（Crawhall 2009a, 2009b）。Arts-ED的領導人Janet Pillai正是參考UNESCO和人類學者John Burton的觀點，將文化繪圖視為

36 《復返》*Return*是James Clifford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書（2013）。前兩部分別是1988年《文化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與1997年《路徑》*Routes*，已經就二十世紀民族誌再現問題和十九世紀以來跨越邊界旅行問題有深入的探討。然而，在面對結局未定的二十一世紀的未來時，James Clifford提出原住民現身的「復返」觀點，將其視為錯綜複雜的後現代性中，面對一個尚未完成的雙重歷史取向（去殖民化和全球化）問題時，可能提出的真正的替代性出路。

「一種工具和技術，以辨識、檔案化和紀錄一個地區的有形和無形文化資產（cultural assets）。無形文化資產包括社會結構、信仰系統、記憶或個人歷史、價值等等。」（Pillai 2013：17）

2008年喬治市入遺之後，面對傳統市場這樣的文化地點所受到的威脅，Janet Pillai與同仁著手展開文化繪圖活動，推動理解傳統地景的意義。這對活動的參與者而言，其實就是一個想像過程，由遺產工作者引導學員進入在地脈絡，捕捉其中的活文化圖像，再以繪圖方法加以整合理解。而這一方法一旦熟悉，更能推廣使用：從〈Campell市場繪圖〉、到〈走入老街〉繪圖，再到〈和諧之旅〉摺頁，都是運用這一想像工具所取得的成果。2013年的〈走入老街〉計畫，更是將特定時空具體的在地人物形象、生命故事，通過現場互動、敘事，再整理繪製成摺頁畫冊。雖是一項承接官方訂製的活動，但執行者設定的目的不是去確立歷史證據，而是創造一種社群對於老街記憶的想像工具，所以格外注重社區互動，強調檳城老精神的活化。

本文第一個觀點即是認為，檳城遺產中介者們種種看似檔案化的操作，包括調查建檔、手冊導覽、文化繪圖等轉譯文本，其實都是無形文化遺產的想像工具，是讓居民、公民、遊客可以「復返」傳統走進「脈絡」的方法。

（二）想像工程：在文化工地打造無形基礎設施

作為想像工具的文化繪圖，因此並不是最後變成了手冊的那些圖文成果，而是行動者走入社區，然後再分離的體驗過程。文化繪圖的認識論，可以說，既有別於科學地圖製作所採用的再現的、觀看的、外部的、分離的、普遍性的「全球觀點」，也有別於居民日常生活的、直接的、傾聽的、內部的、經驗的、地方性的「環場觀點」（Ingold 1993），³⁷而是一種兼具全球普

37 Tim Ingold（1993）為了討論人類與環境關係的涉入方式，區分了兩種環境主義的存有論：全球（Globes）與環場（Spheres）。所謂全球觀點（global vision），是處在一種分離的觀看位置，從全球外部來觀看球體表面，因此知識容易建構，以間接再現方式，描繪地形樣貌與劃上邊界，例如幾何學、地理學等知識繪製的地圖。所謂的環場觀點（spherical vision），是一種直接的介入與生活的體驗，是在內部去傾聽環繞的世界，因此生活世界是被經驗而生的，但由於沒有經過一種分離過程，難以被分離以再現方式去建構知識，因此只能被經驗，而不能在心靈上進行思維的認知。

遍觀點與地方環場觀點，並中介於兩者之間的辯證視野。這一認知活動，我將之稱作「走動式的遺產凝視」。

所謂走動式的遺產凝視，不再是視覺上的定點觀看，而是一種移動中視野變化過程。它既不同於Michel Foucault (1963) 批判的臨床權威的「醫學凝視」，也與社會學者Urry「觀光凝視」裡主客對立的情境相異 (Urry and Larsen 2011)，而是呼應了Tim Ingold和Jo Lee Vergunst (2008) 所提出的「走動式」(Ways of Walking) 概念。正如Tim Ingold (2012) 在《想像地景》中所說的，想像力的發生是沿著多感官的參與路線而形成的一種心智能力，是在橫越道路、採擷或蒐集生活的行走中，才得以認識文化、體現文化、生產文化的。

本文研究的喬治市走動式體驗案例，已經清楚顯示，想像地景的發生，有賴於新的移動路徑的創生。〈文化繪圖〉、〈走入老街〉口述史等等，只是喬治市遺產工作者中介人們走進想像世界的指引工具。其介入社區的遺產行動，並不是一種文化保守的保存行動，而是一種在想像地景中進行移動的路徑探索過程，是抽象的普世價值具體化的一種學習之路。

走動式的遺產觀點的形成，建基在遺產中介者為參與者打造中介時空的無形路徑。這一想像工程的施作，是在時間與空間的縫隙中探索路徑，提供導引。在此，我們不妨嘗試拓展人類學者Lourdes Arizpe論及ICH時所提出的「文化工地」概念。誠如前文所言，文化工地概念雖然有一定的解釋效度，但Lourdes Arizpe不曾具體說明存在其中的創造機制。而從喬治市ICH的實作經驗，我們看見了遺產中介者的行動特性，正有如在文化工地上搭建一座無形的橋，讓參與者能夠由此跨越抵達彼岸的想像世界，在時空縫隙之間去體驗喬治市的無形文化遺產。

所謂時間的縫隙，簡單講就是在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由於過去有關人們生活的種種，隨著歲月流逝而逐漸消失，藉由現在ICH的想像工具（文化繪圖、口述史）的生產，參與者穿梭往來不同的時間縫隙，在其中尋找過去片段的記憶與經驗，再將記取的經驗重新組裝，賦予新的遺產價值。而所謂空間的縫隙，則是在熟悉空間與陌生空間之間，導引參與者進入其日常生活不會接觸或無法進入的他性空間，藉此多樣化參與者的生活範圍與活動路

徑。遺產中介者的工作就是要建設一種幫助人們穿越時空的文化基礎設施。

在無形文化遺產這一文化工地上，進行想像工程的施作，進而催生一種動態的遺產觀點。這一過程，借用人類學者Vincent Crapanzano在《想像的地平線》*Imaginative Horizons* (2003) 中的描述，就是在後土原鄉 (Arrière-pays)、之間 (Between)、中間 (Betwixt)、踰越 (transgression)、病痛、希望、回想、終結等空白或不尋常之處，將任意的相鄰元素或事件給連結起來，而創造感知新的想像視野 (imaginative horizons)。Vincent Crapanzano理解的想像方法，既不是一種意像的文化分析，也不是將想像視為一種 (因跨文化而彼此相異) 的能力，而是因激情感觸而讓人跨越模糊邊界 (此在與彼世/他方等之間) 的生動時刻。藉由介隙位置 (interstitial positions) 具有的流動性，人得以放下追尋線性論證那種虛假的全知承諾，轉而創造一種不斷超越中的想像地平線。

本文所謂「遺產想像」的第二層事實就體現在，遺產中介者亦是在文化工地上進行想像工程的關鍵施工者，他們非只是清冊登錄工程等遺產管理的操作者。ICH活文化的體認，需要跟隨前人足跡，在邊走動邊說故事的過程中，才能啟動認知。但是，所謂「前人」不一定是指遺產承載者或居民，還可藉由遺產中介者在文化工地打造的無形基礎設施，讓參與者進入多種可能中介時空的無形路徑，穿越時空縫隙，生成新的無形文化遺產想像視野。無形文化遺產的想像，與都市空間規劃的建築工程與城市想像不同，亦與更新社區培力的社區營造工程及社會想像有所區別，因為文化遺產作為一種無形基礎設施，乃是一種不斷創造更新想像視野的文化工地。

(三) 想像轉化：從「再現競技場」轉向「訊息交流地」的新觀念

國際人類學和民族學學會 (IUAES) 成立的「無形文化遺產委員會」在2012年的墨西哥會議上提出可將ICH視為一種「再現的競技場」，我們的觀察也證實，遺產中介者在文化工地打造無形基礎設施，的確不免會把不同人群帶入再現之爭。特別是走動式的遺產體驗，打造一種新的走入社區的路徑，更是必然要介入真實的社會關係，觸發價值觀的衝突。

本文所舉〈和諧之旅〉的案例中，最初的「宗教漫步」路徑設計，就引

起了喬治市伊斯蘭教徒的反對。他們認為沒有所謂宗教和諧街的可能，因為這與他們信奉的一神論相牴觸。這時如果遺產中介者繼續堅持整體觀的文化「再現」論，勢必會因為族群認同政治的強化，而使族群關係陷入更大的矛盾。幾經周折，以NGO為主體的遺產中介者，最後是採取了一種將宗教遺產轉以藝術形式加以表達的想像策略。這樣調整過後的遺產操作，自然依舊無法化解馬來西亞社會既存的伊斯蘭教與其他宗教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是通過訴諸於宗教生活中最為共通的自然元素，而不是侷限於特定宗教的象徵或儀軌設定，「和諧之旅」的路徑設計於是跨越了既有界線，打開了一種新的想像視野，把原本帶有封閉性的宗教文化遺產，帶離了族群再現競爭的陷阱，轉向某種相互開放的想像能力的習得。

推動這一轉向的「社區文化藝術教育組織」（Arts-Ed），作為喬治市遺產中介關鍵的NGO組織，值得我們再多加說明，因為他們的思路與做法充分顯示了想像力在無形文化遺產場域的活化作用。

David Berliner（2012）在研究寮國Luang Prabang世界文化遺產個案中指出，鄉愁是製作遺產的驅動力。從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的遺產行動者們的經歷來看，這一因素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這一批遺產中介者，主要是成長於60到80年代的世代，例如Arts-ED的領導人Janet Pillai，³⁸或是檳城古蹟信託（PHT）協助世遺辦公室執行《傳統行業調查》的Linda女士等，她們都表示，對現代工業發展以前的傳統世界某種程度上的鄉愁經驗與懷舊情感，是

38 例如，「社區文化藝術教育組織」（Arts-ED）的創辦人，Janet Pillai（1956馬六甲—），父親移民自斯里蘭卡。她從小生長在馬六甲多元文化社群，並感受到各種根植於在地宗教與文化脈絡中的表演藝術，以及各種在街頭舉行的儀式活動。17歲時全家搬移至吉隆坡，因為姐姐就讀馬來亞大學（UM）緣故，她參加了該校的馬克思讀書會，並有機會觀看該當時蓬勃發展的實驗劇場。後來因為哥哥就讀檳城理大，得知該校有活躍的社會活動情形，因此Janet Pillai於1974年便前往進入理大（USM）社會系就讀。當時正是馬來西亞國家文化打造與身分認同爭辯的時代，Kompleks Budaya Negara（KBN民族情感陣線）於1975年啟動「兒童戲劇計畫」，她開始投入兒童戲劇工作。1983-1984年間前往夏威夷攻讀兒童與亞洲藝術碩士，然後返國在吉隆坡第五藝術中心「青年劇場計畫」（Teater Muda Program）支持下推動兒童戲劇。1985年返回理大擔任講師，並開始在檳城推動青年劇場計畫，即後來的檳城理大青年劇團（Young Theatre with USM, 1990-2000）。2000年Janet Pillai離開講師工作，成立Arts-Ed，並推動「城市小孩計畫」（Anak-Anak Kota）。參考整理自<http://politicalbeanie.tumblr.com/post/74818318972/the-janet-pillai-interview>

促使她們從90年代起就積極參與古蹟保存乃至當代遺產護衛行動的原因。

但是，鄉愁想像作為遺產行動的原因，卻並不意味著遺產中介者會將復原過往視為其最終目的或期待結果。事實上，大部分喬治市參與遺產行動的NGO團體，都不是也不能以召喚鄉愁為目標。例如，在宗教漫步的案例中，當遺產中介者最初以宗教和諧試圖召喚前工業化時代的老街鄉愁時，卻意外引來了伊斯蘭教徒的反對，甚且激烈的情緒反彈。從宗教社群的角度來看，在一神教信仰的排他性之外，宗教實踐本身就是超越了過去、現在、未來的區分，訴求一種永恆的真理，因此宗教人士自然是無意參與多元鄉愁召喚的戲碼的。

事實上，遺產想像若以鄉愁為目標，必然就面臨究竟要召喚「誰的鄉愁」的問題。而一旦進入ICH的再現競技，碰到價值差異與衝突，就很難化解不同鄉愁之間的矛盾？

面對這種矛盾處境，本文所觀察的遺產中介者，發明了一個極有創意的轉化行動。他們避開象徵再現的糾纏爭端，發動實作的藝術化表達，從而化解了伊斯蘭宗教人士對遺產漫步的反彈情緒。而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樣的轉化，我們認為，是因為他們根本的目標在於「交流」：從宗教與宗教的各自並存，轉到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這一轉向中，想像力發揮了神奇的作用，因為遺產中介者提出以最為普世本質的物質元素（月亮、水、植物等）為題，邀請不同的宗教人士將各自宗教對這些元素的想像以藝術形式加以表達，憑藉普世元素提供的共通平台進行人文訊息交流。

宗教場域從信徒各自信仰的一種真理世界，轉化為文化遺產活動參與者們展開藝術想像的文化工地。這個案例凸顯的遺產想像，恰恰不是以鄉愁為旨歸的傳統再現，而是以創造為方向的訊息交流。對喬治市的遺產中介者而言，無形文化遺產的彰顯目的不是「再現」競爭，而是異質「交流」。縱使面對伊斯蘭宗教人士的反對，歷經十年，遺產中介者始終不放棄他們「介入交流」的角色定位，而且Arts-Ed的工作人員更著意推動「遺產漫步」活動，鼓勵學童從「路線接受者」變身「路線規劃者」，擔任路線設計者的角色，還通過組織兒童參與角色扮演的遊戲，努力溝通不同文化的想像與理解。例如那個在葉姓宗祠小孩中邪的故事，能有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小孩穿上佛教

戲服一同演出，正是這樣的想像轉化機制所創造的可能。

對文化遺產領域常見的再現競技所引發的情緒反應，作為遺產中介者的Arts-Ed選擇以藝術和遊戲活動加以化解，之所以符合想像運作的機制，我們不妨以研究想像力聞名的心理學者Paul Harris的觀點再略加說明。他於1990年代開始研究「佯裝遊戲與想像力的發展（Pretend Play and Imagination）」，嘗試證明孩童的想像力在認知發展中起關鍵作用，這些成果最後彙整於2000年出版的《想像力的運作》*The Work of the Imagination*一書。在此書中，Paul Harris提出不同於Sigmund Freud和Jean Piaget的論點。兩位心理學大師皆認為想像只是學齡前孩童的過度狀態，最終會從想像過渡到理性；Paul Harris卻主張，兒童可以清楚分辨現實與想像的不同，知道進出遊戲的想像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邊界，幼童是在佯裝遊戲與角色扮演的遊戲過程中，逐步發展出一種人類特有的想像能力，以超越自身的侷限，邁向更多未來之可能。不過，Paul Harris在該書第四章〈想像力與情緒〉（Imagination and Emotion）中指出，六歲以前的幼童對於進入遊戲想像所引起的情緒，卻無法在離開之後加以切割；相對的，學齡兒童則能適當處理想象世界的情緒，不會帶進現實世界。

Arts-Ed運用藝術和遊戲來護衛文化遺產，可說正是充分切合想像活動開放性的本質特點，又以明確區分想像與現實的處理方式來有效地調節情緒。觸及宗教情感的符號系統，任其保留在信徒的現實世界裡，以免挑起宗教人士對於外部介入的負面情緒。再以藝術與遊戲訊息的想像性，讓所有參與者能激發創造力來發明不同路徑的意義，催生新的人文情意。她們雖是ICH路徑的拓展者，卻沒有將詮釋權力攬在自身，但也沒有獨尊只有傳統宗教人士能夠決定宗教場所的再生產意義，而是充分發揮無形文化遺產的「不確定性」，期許不同族群與宗教背景的學童，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未來新的路徑的創生者，以此打開遺產作為文化工地的想像力生成之地。

透過喬治市遺產中介者在實踐中逐步發展起來的走動式體驗案例，我們看到ICH可以不再只是「再現競技場」，而有可能脫離召喚鄉愁的傳統主義，轉以想像視野生成變化所需的開放狀態為目標。所以「遺產想像」概念的第三個面向，即想像轉化，就是希望解構文化「再現論」的整體性、代表

權與固定性，將無形文化遺產理解為發生想像轉化的人文訊息交流之地。

六、後記：一段有想像力的遺產行動過程（2008-2016）

喬治市遺產活動源源不絕的想像力，其實是NGO團體努力二十幾年的社會積累，及其與官方力量長期拉鋸競合的結果。申遺的啟動，與其說是國家官方行動或州政府官方行動，不如說是檳城NGO長期努力爭取的結果。馬來西亞政府不樂見以華人為多數的檳城成為境內第一個世界遺產地，刻意要求喬治市與馬六甲聯合申請。而2008年最終順利入遺，又恰逢地方政局大變，讓喬治市的NGO取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自由行動條件。³⁹2008年入遺之後到2010年間，甚至被不少NGO團體稱為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在那段時期，NGO團體的成員，以及各個不同位置的公民行動者，紛紛出任州政府的諮詢顧問，並實際介入居民遺產意識的啟蒙，與族群團體一起思考投入，創生出一個別具活力的新興遺產場域。經過八年的努力，喬治市遺產活動已經相當成熟，但同時也面臨另一種危機的開始。⁴⁰

本文記述的這段時期（2008-2016），如今已成為歷史。然而喬治市遺產工作者在入遺之後，摸索ICH實作的想像試驗，護衛活文化的創造過程，是值得我們注意和記取的寶貴經驗。正如Richard Long的大地藝術走入地景進行創作，攝影作品只是最後刻化軌跡的一個紀錄，重要的是地景想像過程的鮮活力量，喬治市這群NGO工作者，回應世界文化遺產體制，探索創造的這些想像活動，正是無形文化遺產能夠維護其活性的關鍵所在。而本文嘗試揭示

39 2008年7月在UNESCO宣布通過之前，馬來西亞舉行大選，結果申請加入世界遺產的許子根政府民政黨落敗，由領導民主行動黨的林冠英取得執政權。當後者上任不久，就從巴黎UNESCO總部宣布這樣一個入遺的大禮物。由於這是一個全新的政治任務，再加上檳州政府選舉在2008年變天，讓NGO在有形文化遺產和無形文化遺產的制度化過程，扮演相當關鍵角色。

40 2016以後檳城面臨一種新的危機，出現各式行動者進入遺產場域爭奪權力的情形。官方亦開始以公權力介入私領域的活文化實踐。NGO工作者很多人已離開這個遺產場域，而喬治市世界遺產機構團隊也幾乎離職一半。年年舉行的遺產活動，依然相當熱鬧，但權力主控者，已從社會行動者易位，州政府逐漸成為主導者。來自全球的世界遺產專家與菁英，逐漸成為喬治市世遺辦公室與媒體最新關注焦點，而原本中介協調的遺產工作者，卻有慢慢被當作局外人的邊緣化趨勢。

的「想像」轉向作為無形文化遺產活動的關鍵機制，則希望能為人類學遺產研究帶入一些新的活力。

參考書目

黃木錦 Ooi, Bok Kim

- 2012 喬治市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qiaozhishi denglu shijie wenhua yichan [George Town 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刊於[In]檳城華人兩百年 bincheng huaren liangbai nian [The Chinese: Two Hundred Years in Penang], 謝世堅主編 xieshijian zhubian [Cheah, See Kian], 頁359-392。檳城：韓江學院 Penang: Han Chiang College。

Aikawa, Noriko

- 2001 The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 (1989): Actions Undertaken by UNESCO for Its Implementation. *In* Safeguarding Traditional Cultures: A Global Assessment. Peter Seitel, ed. Pp. 13-19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Folk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2004 An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Preparation of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International* 56 (1-2): 137-149.

Aikawa-Faure, Noriko

- 2009 From the 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Intangible Heritage.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 eds. Pp. 13-4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gé, Olivia, and David Berliner

- 2015 Introduction: Anthropology of Nostalgia- Anthropology as Nostalgia. *In* Anthropology and Nostalgia. Olivia Angé and David Berliner, eds. Pp. 1-16.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Arantes, Antonio

- 2009 Heritage as Culture: Limits, 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ventories.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unitie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shiyuki Kono, ed. Pp. 51-75. Antwerp, Oxford, Portland: Intersentia:

Arizpe, Lourdes

- 2012 The Need for Research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First ICH-Researchers Forum.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ESCO'S 2003 Convention. Final Report. Yasuyuki Uzawa, ed. Pp. 28-30. Osak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2015 Culture, Diversity and Heritage: Major Studies. New York: Springer.
- Arizpe, Lourdes and Cristina Amescua, eds.
- 2013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ew York: Springer.
- Berliner, David
- 2012 Multiple Nostalgias: The Fabric of Heritage in Luang Prabang (Lao PDR).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 S.) 18: 769-786.
- 2015 Are Anthropologists Nostalgist? *In* Anthropology and Nostalgia. Olivia Angé and David Berliner, eds. Pp. 17-34.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Blake, Janet
- 2001 Developing A New Standard-setting Instrument for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 for Consideration. Paris: UNESCO.
- 2013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Droit et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Marie Cornu, Jérôme Fromageau, and Christian Hottin, eds. Pp. 89-112. Paris: L'Harmattan.
- Bodolec, Carolin
- 2012 The Chinese Paper-Cut: From Local Inventories to the UNESCO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In* Heritage Regimes and the State. Regina F. Bendix, Aditya Eggert, and Arnika Peselmann, eds. Pp. 249-264. Germany: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tingen.
- Bortolotto, Chiara
- 2011 Le trouble du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In* Le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Enjeux d'une nouvelle catégorie. Chiara Bortolotto, Annick Arnaud, and Sylvie Grenet, eds. Pp. 21-43.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 Brown, Michael
- 2004 Heritage as Property. *In* Property In Question: Value Transform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Katherine Verdery and Caroline Humphrey, eds. Pp. 49-68. Oxford: Berg Publishers.
- Byrne, Denis

- 1991 Western Hegemony in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Management.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5 (2): 269-276.
- 2008 Heritage as Social Action. *In* The Heritage Reader. Graham Fairclough, Rodney Harrison, John H. Jameson, and John Schofield, eds. pp. 149-17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Marcus
-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lifford, James
-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Route: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13 Return: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rbin, Henry
- 1958 L'imagination créatrice dans le soufisme d'Ibn'Arabi. Paris: Flammarion.
- Crapanzano, Vincent
- 2003 Imaginative Horizons. An Essay in Literary-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awhall, Nigel
- 2009a The Role of Participatory Cultural Mapping in Promoting Intercultural Dialogue. Paris: UNESCO.
- 2009b Building Critical Awareness of Cultural Mapping: A Workshop Facilitation Guide. Paris: UNESCO.
- Da Cunha, Manuela Carneiro
- 2001 The Role of UNESCO in the Defense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 Safeguarding Traditional Cultures: A Global Assessment. Peter Seitel, ed. Pp. 143-148. Washington D.C.: UNESCO-Smithsonian Center for Folk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
- Denhez, Marc
- 1997 Background Memorandum on a Proposed System to Honour Cultural Spaces with Remarkable Intangible Heritage. Paris: UNESCO.
- Di Giovine, Michael
- 2008 The Heritage-Scape: Unesco, World Heritage, and Tourism. Plymouth, N.H.: Lexington Books.
- Durand, Gilbert
- 1960 Les structures anthropologiques de l'imaginaire. Paris: Duonod.

Foucault, Michel

1963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edica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6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Paris: Gallimard.

Fournier, Laurent Sébastien

2012 *The Impact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ESCO Policies in France*. *Traditiones* 41 (2): 193-206.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eismar, Haidy

2015 *Anthropology and Heritage Regim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4: 71-85.

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d

2016 *Books of the Month programme*. <http://www.gtwhi.com.my/educate/oral-history-documentation/cherita-lebuh-chulia-2013-blog.html>. Accessed July 1.

Graham, Brian

2002 *Heritage as Knowledge: Capital or Culture?* *Urban studies* 39 (5-6): 1003-1017.

Harris, Paul

2000 *The Work of the Imagination*. Oxford, UK: Blackwell.

Harrison, Rodney

2013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2001a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b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 Temporality, 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7(4): 319-338.

Herzfeld, Michael

2006 *Spatial Cleansing: Monumental Vacuity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11: 127-149.

Hewison, Robert

- 1987 *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 London: Methuen Publishing Ltd.
- Hirsch, Eric.
- 2010 *Property and Persons: New Forms and Contests in the Era of Neoliberal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9: 347-360.
- Hitchcock, Michael, Victor King, and Michael Parnell
- 2010 *Heritage Tou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penhagen: NIAS Press.
- Hooper-Greenhill, Eilean
- 1992 *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Ingold, Tim
- 1993 *Globes and Spheres: The Topology of Environmentalism*. *In Environmentalism: The View from Anthropology*. Kay Milton, ed. Pp. 31-42. New York, NY: Routledge.
- 2011 *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012 Introduction. *In Imagining Landscap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onica Janowski and Tim Ingold, eds. Pp. 1-18. Farnham: Ashgate.
- Ingold, Tim and Jo Lee Vergunst
- 2008 Introduction. *In Ways of Walking. Ethnography and Practice on Foot*. Jo Lee Vergunst and Tim Ingold, eds. Pp. 1-19. Farnham and Burlington: Ashgate.
- Jacobs, Marc, Jorijn Neyrinck, and Albert Van der Zeijden
- 2014 UNESCO, Brokers and Critical Success (F) Actors in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olkskunde* 115 (3): 249 -256.
- Janowski, Monica, and Tim Ingold, eds.
- 2012 *Imagining Landscap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Farnham: Ashgate.
- Jeudy, Henri-Pierre
- 2001 *La Machinerie patrimoine*. Paris: Sens & tonka.
- 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
- 2004 *Intangible Heritage as Metacultural Production*. *Museum International* 56 (1-2): 52-65.
- Kuutma, Kristin
- 2013a *The Politics of Contested Representation: UNESCO and the Masterpie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Prädikat "Heritage": Wertschöpfungen aus kulturellen Ressourcen*, D. Hemme, M. Tauschek, and R. Bendix, eds. Pp. 177-196. Berlin: LIT.
- 2013b *Concepts and Contingencies in Heritage Politics*.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ourdes Arizpe, and Cristina Amescua, eds. Pp. 1-15. Cham-Heidelberg-New York-Dordrecht-London: Springer.

Labadi, Sophia and William Logan

2016 Approaches to Urban Heritag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In* Urban Heritag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Sophia Labadi and William Logan, eds. New York: Routledge.

Latour, Bruno

1991 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 Essai d'anthropologie symétr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Lowenthal, David

1985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guet, Frédéric

2011 L'image des communauté dans l'espace public. *In* Le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Enjeux d'une nouvelle catégorie. Chiara Bortolotto, Annick Arnaud, and Sylvie Grenet, eds. Pp. 47-73. Paris: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Machuca, Jesús Antonio

2013 Challenges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ourdes Arizpe and Cristina Amescua, eds. Pp. 57-69. Cham-Heidelberg-New York-Dordrecht-London: Springer.

Morin, Edgar

1951 L'homme et la mort. Paris: Points Seril.

1956 Le cinéma ou l'homme imaginaire: Essai d'anthropologie. Paris: Minuit.

Penang Global Ethic Project

2016 George Town, Penang-A Microcosm of Unified Diversity.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ww.globalethicpenang.net/index.htm>.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17 World Religions Walk-Penang, Location Map.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ww.globalethicpenang.net/webpages/act_02b.htm. Accessed June 25.

Penang Heritage Trust (PHT)

2018 PHT Profile.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ww.pht.org.my/pht-profile/>. Accessed August 8.

Pillai, Janet

2013 Cultural Mapping: A Guide to Understanding Place, Community and Continuity. Selangor: SIRD.

- Preston, James.
1991 The Trickster Unmasked: Anthropology and the Imagination. *In*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Ivan Brady, ed. Pp. 73-110, Savage: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Samuel, Raphael
1994 Theatres of Memory: Past and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Silverman, Helaine
2017 Heritage in Action: Making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Helaine Silverman, Emma Waterton, and Steve Watson, eds. New York: Springer.
- Smith, Laurajane
2005 Use of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Tauschek, Markus
2011 Reflections on the Metacultural Natur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Journal of Ethnology and Folkloristics* 5(2) : 49-64.
- Testa, Alessandro
2016 From Folklore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bservations about A Problematic Filiation.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 119 (3-4): 221-243.
- Thrift, Nigel
2008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UNESCO
2017 World Heritage List. Melaka and George Town, Historic Cities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hc.unesco.org/en/list/1223>. Accessed July 1.
- Urry, John and Jonas Larsen
2011 The Tourist Gaze 3.0. New York: Sage.
- Vannini, Phillip
2015 Non-Representational Research Methodologies: Re-Envisioning Resear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李威宜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30013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

wilee@mx.nthu.edu.tw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Heritage Imaginaries:

Penang Case Study

Wei-I LEE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Facing the vogue of the heritage study over decades, what ca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do? This paper aims to propose an approach of heritage imaginaries, based on observations at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George Town, Penang, Malaysia. First, in presenting debates occurred during the elaboration proc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conventions at UNESCO, I will briefly examine two new roles that anthropologists are playing in the renewal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Heritage regime: participant decision-making and observation of mediation activities. Then,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experiences of ICH preservation work carried out in Penang, I highlight the limitations of a rescue mentality and the archiving process, review the difficulties of ICH safeguarding, and clarify th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ICH as “representation.” Finally, in order to explore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heritage, I will propose to take the heritage mediators as objects of research, and observe the work of imagination in concrete walking experiences. In my conclusion, I try to elaborate the concept of “heritage imaginaries” with three principal ideas crystallised through the Penang case: the return to traditional context as a tool of imagi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infrastructures as imaginative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s as sources of imagination.

Keywords: heritage imaginaries, mediators, representation, walk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George Town
